

世象杂谈

记得还是五十多年前读小学的时候,参观一个规模很大的工业展览会。直至今日,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里面全是塑料制品的房间,床桌椅碗筷、筷瓢勺盆盆盒桶等等等等,全都是色彩缤纷的塑料构建。当时的介绍是,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一种甜美而精致又科学的生活。也真是的,后来随着这些物品一件件走进实际,我们仿佛正在步入当年的理想。

但是,当塑料制品越来越泛滥的时候,科学家开始发出警告,说这些东西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毒的,是危害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问题是那么骇人听闻、惊心动魄,因为塑料制品不是仅仅在地下一百年以上才会融化,而是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已经让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终于,有关方面很快宣布禁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紧接着,更是有了一个名闻遐迩、威震八方的“限塑令”——在各种场合严禁使用塑料袋,尤其是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事实上,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真的禁了吗?塑料袋真的消失了吗?大大小小的餐馆饭店,那种发泡餐具至今没有停用过,而塑料袋,只是在超市或者便利店收费提供,而在菜市场小摊更是畅通无阻。但是,有关方面就在前不久做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统计,说是这些年塑料袋塑料制品禁用有670亿个——我真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样本统计出来的——由此折算就相当于节约石油600万吨,约占大庆油田年产量的1/6,可供280万辆汽车行驶一年,折合标准煤850万吨……真是让人太高兴太兴奋;还不幸福么?

我没有本领去验证670亿个的确凿与

发泡餐具的命运转折

马以鑫

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老百姓普遍有了环保意识,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发泡餐具塑料袋这类玩意儿是白色污染,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好处。于是,只是似乎在无奈之中,还是会上发泡餐具塑料袋之类。

问题就在于,我们禁用了这个禁用了那个,应该有相应的物品来替代呀。但是,没有,真的没有。到了海外,看到顾客在超市走出,大多是一个个纸袋拥抱着胸口,我好羡慕呀,人家的纸可真多呢,不过,也许,是再生纸吧?

就在我们宣布禁用限塑的巨大成就时,有关方面宣布,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予以解禁,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可以大胆放心使用啦。其理由是,这东东使用后可回收再利用,国际上很多国家在使用能节约石油资源云云云云。这不是同禁用后的巨大成就就非常矛盾非常对立非常不协调吗?难道是因为成就巨大就可以就此解禁就此从头再来?

为了扩大知识面、了解更多,我查了有关资料。原来,国外启用的这类物品,有着很多前提。首先是改进制作原料,让发泡聚苯乙烯能抗冻、能保温,其次还改进高分子材料,使制品能吸收肉类的血水,同时延长保鲜期2-7天。老实说,要能够成为这样的崭新面貌,非得有高科技大投入大投资不可,也是一般小企业所无法做到的。反观我们,生产这类发泡餐具什么的大多是些手工小作坊,讲究的是成本越低越好最低到零。就在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新闻报道说,解禁第一天,一家小店随即进货发泡餐具十五万只!天哪,我想,这里肯定不会有高科技,也不会有“谁污染谁负责”之类紧跟措施的吧?

本文草就,看到有消息称,这次解禁是广东10家企业出资450万元请北京某律所公关游说的结果——看来又是一篇文章了。

记得有一次看周星驰施主的片子中有一段品酒的部分,让人记忆深刻,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有位女施主拿了一杯葡萄酒让很多人品尝,大部分人都把酒一饮而尽,结果大家都说,这个葡萄酒又酸又涩,实在不好喝。后来周星驰扮演的角色是这么说的,这是一杯好酒,只是有的人品的方法不对,舌头上品味酸涩的味蕾在舌头两侧,而甜味的味蕾在舌尖部位,想品尝好的葡萄酒,就要把舌头卷起来,只有舌尖的味蕾品到甜味、避开两侧味蕾品到的酸味。

生活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要学会剥离掉酸涩的部分,去体会香甜感觉。

戒嗔所住的茅山,山路很窄小,它是一条由小青石板拼接而成的道路,只是不知道这些石板是什么年代的,因为没有人负责修葺,有些路段石板已经变成碎石,不太好走了。戒嗔三位师父之一的智缘师父,因为佛法修为高深所以极受小镇里的施主欢迎,每隔些日子,智缘师父便会在寺里讲些佛经里的故事,这是施主们最喜爱的内容,因为那些在常人眼中高深莫测的佛经,由智缘师父讲来,总是那么简单直白,通俗易懂。

有一次,在智缘师父说故事日子的前一天晚上,下了场大雨,山路被雨水浸泡后,变得很泥泞,稍一用力踩上一脚,便会把石头下面的泥水带出来。因为知道智缘师父第二天会在寺里讲故事,所以即使山路很不好走,还是有不少施主赶到寺里。这样的路途,施主们的鞋子上都难免会沾着不少泥土,虽然进寺之前,那些施主们也会在门旁的石块上把脚踏干净,但这样做依然不能彻底,只是一小会,戒嗔就发现寺前院的水泥地,已经满是泥块了。戒嗔叹气道,看来下次应当放个刷子在前门,这样可以把施主们的鞋子弄干净些,可以避免弄脏院子,也不会影响别的施主了。

戒嗔听见有人笑,转头去看,原来是智缘师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戒嗔的身后。智缘师父从旁边走过,迈进满是泥水的小院,他小心地走着,每一步都踏在院子中干净的地方。走到佛堂前的智缘师父转过身对我说,戒嗔你看,泥水虽多,但是这样走就不会污染到鞋子了。说起来,我们生活在尘世中,总要学会自己找个干净的地方落脚。落足于泥水中还是干净的水泥地上,选择权最终在你自己手中。学会在点缀着泥土的院落中跳跃,也是相当重要的。让眼神穿过薄雾落在笑脸上,何必在意有雾障目,阳光出来后,它就不存在了。

岁的人了,还是那么好学,对生活那么热爱,有一次,妻子告诉我,老人来唱歌,还带了零食给她吃,于是下一次她也带零食给廖老师,就像孩子过家家。后来,我们熟了,去看廖老师,她便会谈谈她的过去。

廖老师1918年春天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书香门第,祖上以行医名世。家里还藏有翁同龢为她祖上特地写的对联的拓片:“只知本草经传廖,谁识云岭阁仿倪。”廖老师在常熟读完小学中学后,1937年便跟随清华内迁到昆明西南联大就读。毕业后,回常熟中学教书十年,又到复旦附中教了二十年的历史和外语。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却充满温情和趣味。她叙述自己经历就像老祖母在跟孩子们絮絮叨叨地聊天,聊完一件接聊一件。听她谈话,也像

看她的文章,温情脉脉,趣味盎然,是一种享受。廖老师聊天喜欢谈家常,不愿意涉及国家大事,更不会夸耀什么。在一般人看来很了不起的事,她却说得那么平淡,像是家常便饭。有些很大的事,她居然连提都不提。

比如,她的儿子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才华的学者,曾出版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我看过,思想新颖深刻,文笔极好。她的媳妇陈安娜女士是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是位出色的翻译家。莫言的著作,就是因为她的翻译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可是她从来不及提及,更不会夸耀。这使我深受感动。这才叫大家风范!有一次,我从廖老师家里回来,就为此写了一首小诗,表达了我的这种感受:

廖老鹤发有童心,话今叙旧传真情;政修路上轻轻走,谁知她是联大人。

现在,廖老师悄悄地走了。遗憾的是,我俩和这位世纪老人却没有留下一张合影。前年敬老节,我曾带了相机去,在她家的小客厅,请她媳妇给我们拍了几张照。回家一看,却没有影像。

虽然没合影,但她谈话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成为我和妻子共同的美好回忆。尤其是她那种平和淡然的贵族气质,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俩学习的范本和永久的话题。

南非,被称为“彩虹之国”,从旖旎多姿的花园大道到烟波浩渺的好望角,从风情万干的太阳城到云雾缭绕的桌山,可谓是景色优美而物产丰富。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南非也面临着一个相当严峻的社会问题,即是贫富悬殊。特别是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南非有近四百万名孤儿,大约占其儿童总数23%。这些孤儿的父母大都死于艾滋病,孤儿们生活在极度贫穷中,为疾病、饥饿、失学、住宿所困扰,流浪在社会上,极易受到伤害,并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上海王一亭艺术研究会会长王孝方先生系上海著名实业家、慈善家、书画家王一亭的曾孙,他在南非生活了三十多年,现已回上海定居,但他依然将南非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想为南非孤儿做些慈善之事。去年夏季他赴南非访友,悉知南非宋庆龄基金会正准备在开普敦巴夫莫勒孤儿院内捐助兴建一所孤儿之家“中国馆”,以帮助和改善南非孤儿的生存现状。他不仅积极赞同,并表示将尽个人的努力为此项活动募集资金。王孝方回上海后,即与我商量此事如何操作。经讨论后,我们认为还是发动上海的书画家们捐作品进行慈善拍卖。随后我们即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联系,得到了该会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

为了让上海书画家们真实地了解南非社会的现状,2012年底,我们上海王一亭艺术研究会又组织了上海书画家陈世中、应鹤光、唐逸览等十多人自费考察了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无论是约堡还是开普敦,都存在大量的贫民窟,有的长达数里,孤儿们就生活在这样脏、乱、差的环境中,现实的确令人担忧。于是,12月10日晚在开普敦“上帝的餐桌”——桌山下的中国大酒店家,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梁梳根、南非宋庆龄基金会会长陈清及南非多位侨界代表人士座谈,梁总领事对上海书画家这种博爱精神和慈善之举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南非孤儿之家“中国馆”的兴建,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

爱者为慈,仁者行善。从南非回上海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征集到了高式熊、徐昌酩、陈燮君、陈世中、应鹤光、唐逸览、苏春生、董之一、周逸范、胡考、许思豪等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从而体现出了海派书画家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的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如年届九十又三的高式熊先生,一下子就送来了三幅书法作品,其仁慈之心,颇具楷模作用。陈世中、应鹤光先生回掉了外面的约稿,全身心地投入四尺整张大画的创作,对这次跨国界的慈善之举竭尽全力。王孝方先生也捐出了家藏王一亭的绘画代表作一幅参与义拍,其拳拳之心,令人感慨!

今年元宵节前一天,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王一亭艺术研究会、南非宋庆龄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大爱无疆——援建南非孤儿之家‘中国馆’、上海书画名家精品慈善义拍”在上海延安饭店隆重举行,整个会场都宾客云集,座无虚席,举牌踊跃,共拍得善款一百万元。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正逢在南非召开的第五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的前夕。开普敦非律皮地区的巴夫莫勒孤儿院内,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王一亭艺术研究会、南非宋庆龄基金会捐赠的孤儿之家——“中国馆”的奠基典礼隆重举行,当王孝方和梁梳根总领事将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支票赠给巴夫莫勒孤儿院院长Rosie女士时,全场掌声热烈,孤儿们更是高兴得载歌载舞。

廖景湖老师走了,悄悄地走了,走得很安详,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她的儿媳说,一定要把这寿碗送给黄玉峰老师,他和夫人常来看望老先生的。说来真巧,就是在廖老师去世的那天半夜,我一个翻身把床头的一本书碰翻在地上,声音很响,当时就惊醒了,捡起来,一看是廖老师前年七月送给我的《追思集》。

我之所以经常去看望廖老师,一则是因为廖老师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她是巴金夫人萧珊的同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廖老师的《追思集》记录了她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说了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有趣的掌故,文章朴实无华,娓娓道来。与何兆武先生的那本《上学记》可以互相印证。西南联大是当年自由主义的堡垒,是我十分崇敬向往的圣地,那里有很多很多我敬仰的真正的人。对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我自然十分愿意去和她谈谈。

我去看望廖老师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妻子在复旦老年合唱队与廖老师是队友,她们是忘年交。每次唱歌回来她就会说起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说八九十

廖景湖老师悄悄走了

黄玉峰



Shanghai Lady (水墨画) 彼岸

2013年,对于全上海乃至全中国UFO迷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现代UFO研究在上海(中国)的开展已经整整35周年了。

35年间,一种神秘莫测的飞行物屡屡出现在上海的天空,它们是自然现象、人造物体,还是天外来客?就让我们从轰动一时的飞行“火龙”说起吧。

1981年一个夏夜,有一条飞行的“火龙”从上海、江苏、浙江和东海海域上空一掠而过。当“火龙”在途经舟山巨大岛屿时,发生了收音机收不到电台信号、日光灯不亮、普通电灯发光暗淡等奇异现象。而“火龙”过后5分钟,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值得注意的,巨大岛的奇闻,系来自驻岛部队的报告,真实性不容置疑。笔者的资料库里这份由任满根、章鸣、王明福和吴建武联合签名的目击报告如是说:

时间:1981年6月7日11时17分。

地点:舟山巨大岛屿外高涂。

是夜,驻岛军队某部电话班士兵章鸣从连队查线回来,发现一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正由西北向飞来,这个东西圆球状,脸盆大小(注:观测面积非实际面积),发绿白强光,犹如雷电闪光,十分耀眼,不能正视。飞碟轮廓清晰,圆球后拖着一条约50米长、带有绿白红黄等颜色的尾巴,很像火箭喷出的火柱。飞碟飞行时,圆球不停地转动,但没有声音。这个飞碟在约1000到2000米的高空,由西北向西南,经营房上空飞去,最后在一片暗淡的云层里消失。

目击时间前后共约3分钟,在飞碟出现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它所飞经地带的收音机收不到电台的讯号。在发电厂电压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日光灯点不

亮,普通电灯发红色暗淡的光。这些现象在飞碟离去约5分钟后消失,一切又恢复正常。被章鸣喊声惊醒后起来观看飞碟的其他3名目击者都看到了这一现象。

此前的1980年9月12日,《上海科技报》报道:《火星划破上海夜空》;1980年11月《科学画报》也载文:《华东数百万人目睹的怪天象》。这两篇文章,披露的是同一件事情:揭开20世纪80年代上海和中国数起重大UFO事件序幕的“8.26UFO事件”。

当时,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天空,后面拖着一团尾迹,撕开夜幕,照亮天宇,蔚为壮观。在几乎相同的时间,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以及黄海海面的夜航船上数以万计的目击者惊呼“火龙”!

此后数年间数次出现的飞行“火

破解“火龙”之谜

章云华

龙”,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各种稀奇古怪的传闻也接二连三地传播,事实上,笔者汇总、搜集了大量的相关信息,并和国内数位天文学界名家王思潮、刘炎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试图揭开飞行“火龙”的神秘面纱。我们倾向性的意见是:所谓的飞行“火龙”,其实就是流星群。

众所周知,太阳系中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尘埃和石块到处游荡,被称为流星体。当它们接近地球时,会撞进大气层而坠落。那些大的流星体在大气层中的燃烧时间较长,就会一边燃烧,一边前进,并且碎裂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小流星体,在夜空中,成为“编队”飞行的壮观“火龙”,并被误认为UFO光临,以至于闹得不亦乐乎。

上万人目击的夏夜螺旋状UFO究竟是什么?

十日谈

飞过上海的UFO

